

毕熙东 著

毕熙东深人福

新华出版社

熙东评论

毕熙东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熙东评论/毕熙东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5

ISBN 7 - 5011 - 5249 - 7

I . 熙… II . 毕… III . 体育 - 评论 - 文集 IV . G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6180 号

熙东评论

毕熙东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2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5249 - 7/G · 1915 定价: 26.00 元

序言

序

在這本《中華書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我們有幸看到了歷代文人墨客的真迹。這些書籍不僅是知識的寶庫，更是歷史文化的縮影。每一件書籍都凝聚了當時的文化氣氛和社會風俗，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歷史、了解文化的重要資料。

這本影印文庫，採用了高精度的影印技術，保證了書籍內容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每冊書都經過嚴密的校對，確保了文字的準確性。同時，影印文庫還採用了精美的裝幀設計，使得每冊書都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

這本影印文庫，不僅是我們研究歷史、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也是我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扇窗戶。它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文化，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最後，我們希望這本影印文庫能夠成為廣大讀者的良師益友，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知識和資訊。我們相信，這本影印文庫將會成為一個廣受歡迎的文化產品，為我們的文化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序言：“吃粮食！”

——“很麻烦”的毕熙东

如 寄

这是两句话。前一句是他说我的，后一句是一个“大官儿”说他的。

八年前毕爷有本书，写施拉普纳。山东人民出版社邀他到济南、青岛出席首发式，弄个签名售书什么的。

到了山东地界，他忙着签名、应酬、会各路朋友。我忙着喝酒，然后，再喝。两天下来，他对我说，“大爷，你得吃粮食！”随后逢饭局，他必先将俩馒头放在我面前，“吃粮食！”把一帮山东男女好汉弄糊涂了，以为我的字号叫“吃粮食”。频频举杯，众口一词：“干！尺梁石！”照喝不误。

青岛多丘陵，夜醉回招待所，十之八九是毕爷背回去的。一路上下，艰难困苦。我一米八几，又比较瓷实，毕爷一路背来，总唱《长征组歌》爬雪山那段，再加朗诵。

这就是毕熙东的为人。

所以毕爷为文也厚实。是粮食。鲍鱼龙虾燕窝鱼翅象拔蚌，所谓山珍海味，再加上洋酒啤酒二锅头，都是好吃喝，好东西，但不能当饭吃。任何人离碳水化合物一久，离死也就不远了。在当下体育评论界急红眼似地想“一夜暴名”的当口，看看毕爷这十来年的文章，您就知道什么是“粮食”。吃上几口，肚子里踏实，它“顶时候”。过去出门口远行，兴背上半口袋干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天半个月，敢走千八百里。你端半盆龙虾走走试试？

“吃粮食！”是毕爷对我这个朋友的劝戒和关怀。往深里说，

序

言

也是对我的批语和提醒：多看点“粮食”的书，多写点“粮食”的文章，甭一天到晚离地三尺的比划。可情有负毕爷的厚望，这些年没能为人民提供什么精神食粮。

说到“粮食问题”，有一段事应该让读者知道。广州《足球报》自创刊后就有一个最著名的栏目，叫“京华新村”。是在京的足球大牌写手的“保留项目”。毕爷是这个村的村长。村民进进出出就那么几个人。三四年前，“村长”跟我说，村里有人出国，你帮着顶一下？我自忖不是行里的人，不敢接。毕爷急了，“你就算帮我一个忙！”我应了。毕爷立刻起火做饭，照例是我极爱用的疙瘩汤加芝麻酱糖饼。“受用”完了，我说，那就用“唐丙”（糖饼）作字号？毕爷首肯。这也是合着“粮食”的用意。后来毕爷离任，我也就不再在村里混了。

以上是毕爷的“粮食观”和我个人的一点粗浅体会。

以下是讲第二句，“毕熙东，这个人很麻烦”的由来。

毕熙东这个人刚硬、耿直，在圈里是有名的。所以有“毕爷”、“毕哥”的称谓，属“大爷”级。这其中没有江湖含义。

人要是到了“一根筋”，只认理，不认人，死磕的程度，是比较麻烦的。但毕爷因此还就有一帮朋友，甚至是被他激烈抨击，贬损的人。上次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十强赛”失利，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毕爷的评论是刀刀见血，字字见肉，全捅到中国足球的肋叉子上。可当时中国队的主教练戚务生就是他的朋友。人家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是“给朋友两肋插刀”。因为在理，在情，在义，大戚仍引为知己。“十强赛”后，他请大戚到家里吃饭，自己下厨，还邀了几个朋友。结果院里的毛头小子们认出了戚务生，于是恶从胆边生，但又没什么气魄，于是把放在门口被认为是戚务生的鞋给扔了。结果扔丢的是另一位坐陪朋友的鞋。毕爷是请了一顿饭再搭上一双“耐克”，把人送走了事。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毕熙东的评论中看出一种深沉，看出散落在字里行间的一味味“鲜药”。道行不深，修行浅薄的人，一是没看懂，二是没看透，最惨的是不求甚解。于是这么些年

来，毕爷身边总是峰烟四起，有时干脆就是四面楚歌，杀他的心都有。只是找准地方下手。

这就是“麻烦”的所在。

毕爷的文字讲究。这不在如何豪华，而在深层的逻辑和密实的理论。没“硬伤”不说，北京话，连“掌儿”（小疏忽）都很一见。“杀人”得有“借口”，没“借口”，也找不着“借口”，这人就很难被“杀掉”。毕爷的案边书，枕边书，厕边书，大都是一些历史、哲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书。他用这些“武装到了牙齿”。所以他“咬”人可以，有人要“咬”他，“咬”不动。“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够。据说有几次有人要“封杀”他，但都被他的主管领导给挡了，“毕哥是我们报社的一面旗帜，他怎么啦？”潜台词是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标兵，文章是按党的基本路线写的，“封杀”他不是自我麻烦吗？

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大官儿”扼腕叹息，“毕熙东啊，这个人很麻烦”。

写的这个破序到这儿也比较长了。没有涉及毕爷这个新集子里的任何文章。说老实话，我也没见着。他拿的是校样，在家里熬灯点校。集子中的大部分评论我这些年都看过。以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和融通，我想集子的“歌词大意”我尚能知晓。所以只提供一些毕爷背景材料，供读他这本书的朋友参考。

2001年4月16日 北京

言

序言：纵横捭阖 议论风生

——毕熙东与其作品印象散记

冯耀祥*

毕熙东年仅47岁，在新闻行当里闯荡才十几年，已是《中国青年报》的资深体育记者了。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别人对他的称呼也多了起来，“老毕”、“小毕”、“毕大爷”、“毕大腕”、“毕大侃”……。

理智的选择

《中国体育报》记者如寄在为毕熙东的专著《足球老纳》作的《序》中说：“谈到毕熙东好像就必然谈到足球，这其实是许多人，包括大多数读者和一些新闻界人士的一个错觉。”

尽管是错觉，但在读者心目中，毕熙东的名字确实与足球连在一起。足球是毕熙东体育报道的主要内容。这是他的一个选择。

毕熙东认为，“作为一个体育记者，要报道体育比赛，就应当粗通一些主要项目的比赛规则、技术战术理论，如能精通其中一两项更好，它能对你熟悉要报道的比赛大有帮助。

在众多体育项目中，毕熙东选择了足球作为主攻方向，他认为，体育项目之间彼此相通，而足球基本涵盖了其他体育项目的技术、战术和要求，而且足球运动是集体项目，其中蕴含的社会意义可作哲学上的思考，大有用武之地。

* 作者是新华社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此文写在6年前。

毕熙东似乎与足球报道夙有缘份。他个头不高，方脸重眉，有些同球星马拉多纳相像。他从小就喜欢看人家踢足球，有时自己也上场踢上两脚，中学时加入学校的乐队和运动队，对足球更加熟悉起来。198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他参加《中国青年报》的招聘考试，复试时因为与“主考官”谈足球谈得投机，录取在文化生活部体育组（后独立为体育部）工作。

毕熙东以足球报道为主，却并未沉湎于足球报道，像篮球、排球、游泳，他也都下了相当多的功夫。

如果说在众多体育项目中毕熙东侧重于写足球，那么，在各种新闻体裁中他最拿手的是写体育述评和评论。

我国的体育报道在50年代基本形成了平铺直叙的写作风格，即便有评点，也是引用教练员、裁判员的说法，基本上没有记者的见解。但到80年代，电视日益普及，读者完全可以通过电视了解比赛的全过程，无须文字记者去饶舌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评点和见解就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

毕熙东从进入新闻行当那天起，就瞄上了体育评论和比赛述评，使报道深入一步，即运用与体育比赛有关的翔实的背景材料对体育赛事进行“加工”，使相对于电视的迟到新闻产生新意，回答读者看过电视后常挂在嘴上的“真臭”、“盖了帽啦”、“怎么啦”……等问题。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并且了解到电视上看不到的东西。

毕熙东最初的尝试遇到的困难肯定不会少的，但毕熙东有个倔犟的脾性，认准了的道宁肯走到黑。

1984年，曾雪麟率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中国青年报》连发3篇小评论：《以勇开路》、《以快求生》、《以灵制胜》为毕熙东所写，对青年队的踢法予以评点，在一线教练员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中国足球队在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中获胜，在全国掀起足球热，不少人认为中国足球已达到高潮期。此时毕熙东发表了《从足球热中冷下来之后》，指出此次比赛“并非很高水平

的争夺”，中国队“勇快灵的优势尚不明显”，而且“防守是弱项”，“突出表现在后卫队员抢点争头球的能力差，个人防守能力不强，相互保护意识欠缺，防守缺乏纵深……边后卫力量相对薄弱……”。这些真知灼见得到了有关行家的首肯，认为他很好地在宏观上把握了中国足球队的状况。

特别是在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中，毕熙东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说东道西，指点江山，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其中《足球进入马拉多纳时代》一文，对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精辟的阐述，成为行家、读者争传的妙文。自此，“熙东评论”名声雀起，直至今日读者对“熙东评论”更是喜爱有加。

丰富的内涵

“熙东评论”不是就体育说体育，而是以体育为依托谈天说地，令人读后浮想联翩。

毕熙东说：“体育记者首先是一名合格的记者，然后才是体育记者。只有在具备了一般记者所需要的的文字功夫、新闻知识、较广泛的社会知识和新闻敏感等条件的前提下，再去钻研体育专业，才能使自己对体育圈子里的许多现象有借鉴的依据、启迪的基础；思路才能开阔，分析也就能高屋建瓴。比如，某些有权威的体育记者写出的文章为什么老少咸宜？那就是他虽然论述的话题是体育，是一场比赛，但文章中却富有哲理、知识，有社会意义。因而他的权威性能在广大的读者心目中树立起来。”

毕熙东对社会文化与足球风格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已体现在其足球评论中。1988年欧洲杯比赛期间发表了一组系列评论《绿茵博览会》评论中写道：“你看，德国人军威赫赫，战将如云，纵横驰骋，志在必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缜密的战术设计，高超的军事素养，全队进退有序，浑如一体，昂扬而不失理智。他们在绿茵场上体现出的是歌德的诗篇，是黑格尔的哲学，是日耳曼人骄傲的气度。”

“意大利人热情奔放，浪漫洒脱。蓝白相间的身影像蓝天白云般自然流畅。进攻时层层压上，如地中海的涌浪奔腾；退守时环环相扣，像阿尔卑斯山的重峦迭嶂。骑士般勇武的多纳多尼，凯撒一样的统帅巴雷西，他们身上闪烁着古罗马的历史光环”。

“英格兰在球场上目空一切又不失绅士风度，盛气凌人之中却显露出英雄迟暮之窘状。日不落帝国的霸业解体，现代足球创始人的泰斗心境，在绿茵场上尽露端倪……”在1990年世界杯的评论中，他又依托赛事的进程，进一步丰富了上述观点。

这种评论已超出了体育本身，是通过足球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历史、文化和个性，使读者感受到异彩纷呈、浓烈淳厚的文化气息。毕熙东在评论中写道：“人们从世界杯足球大赛上看到的决不仅仅是输赢胜负，拼搏厮杀；而且也是人类追求、进取、交流、共溶的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人们读毕熙东的体育报道也会得到类似的享受。

毕熙东因而十分强调体育记者的综合修养，即“体育记者还必须有文学、新闻学、美学、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否则，“你所写的报道就难免失之呆板、单调、枯燥、浅薄”。

毕熙东的评论特别具有哲理意味，令人读后回味无穷。1992年奥运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时，“熙东评论”中的《宁静以致远》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出师不利也好，抬头见喜也好，都能骤然临之而不惊。以平常心看待对手，以平常心对待比赛，以平常心对待挫折，更需以平常心对待成绩，那才叫有道之师。”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赛场上我们不提倡淡泊以明志，把握形势却非要宁静以致远不可，切不可学贾雨村那般小人得志，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把一个挺好的前程给玩丢了。”

不是就体育论体育，而是评论体育富有文化意味，甚至像探讨人生一样评论体育运动。

如果说文化厚度是毕熙东作品丰富内涵横的方面，那么，历

史纵深感则是其内涵纵的方面。譬如 1990 年亚运会期间他与陈小川合作的评论《“东亚病夫”祭》，以体育运动在我国的发展为线索，谈古论今，纵横捭阖，令人感受到历史沧桑，思古而察今，获取多种启示。

文章一下笔就把人们带回到久远的过去：“1896 年 10 月 17 日，《字林西报》载：‘夫中国——东亚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评论接着历数“腐朽的清廷大辱加身而不知耻……八旗子弟斗鸡走狗，偶有蹴鞠、掼跤，意在取悦帝王，早已失却‘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气魄”；“尽管洋务派主张‘新操练兵’，尽管北洋水师学堂设立‘拳击、哑铃、足球、跳栏’诸科目，但抱残守缺的遗老们大摇其头，斥之为‘奇技’、‘卖国’、‘大逆不道’”；北洋军阀时期“白骨遍野，民不聊生，体育更是江河日下”；国民党政府“举办了三届全运会，参加了三次奥运会，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和自寇‘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狂妄野心，终使我国土沦亡，山河破碎，斑斑血泪，洒向西风。哪里有中国体育生存发展的土壤？”……

这一系列的回顾令人感慨万端，思前事以鉴今日之行，怎不令人深感重任在肩呢？

这篇评论还列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成就。前后对照，既是对今天的歌颂，也是对历史的回应。评论的最后两段就是回应历史所得出的结论：

“别了，‘东亚病夫’，中国人民永远埋葬了你。”

“别了，‘东亚病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着你。”

宏观的思考

毕熙东的作品具有一种宏大的气势，这是对体育比赛宏观思考和宏观把握的结果，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特别表现在

占了他作品的大部分的综述性文章，几乎每次重大比赛后都有他的综述文章见诸报端。

第 23 届和第 24 届奥运会结束时他都写了长篇综述文章，尤以第 24 届奥运会综述《一次全方位的考核》最为读者所称道。在这篇长达 5500 字的综述中，作者客观分析了中国代表团战绩不佳的原因——“首先，我们以往的优势项目不再有优势”；“其次，比赛环境变了，对手情况变了”；“第三，心理状态变了”；“再有，思想准备不足”。同时，又从传统的民族心态和民族心理需求的角度，阐述了中国体育总体发展过程中失掉一次良机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第 23 届奥运会上取得的成就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使刚刚清醒的头脑又开始膨胀起来”，从而总结了在更新观念、改革体制、改革管理、改革训练等关系到中国体育事业腾飞的重要环节上应记取的教训。通篇分析全面深刻，有理有据。如果没有对中国体育有较为深远的理解，没有对奥运会的全盘驾驭，是无法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提纲挈领地剖析清楚的。

在第 24 届奥运会中的另一篇长篇报道《大泽腾蛟——中国游泳运动变奏曲》，同样表现出毕熙东运用素材的高超技术和对宏观局势的总体把握。文章从建国前的游泳运动之惨状写到建国初新中国健儿不能参加世界比赛的遗憾，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沉痛反思、艰苦训练写到以第 24 届奥运会为标志的“大泽腾蛟”，娓娓道来，而且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中国游泳队从四年前的一无所有，到今天奥运会上的 10 个项目进入前 8 名决赛；取得了 3 块银牌，1 块铜牌，一个第 4 名，4 个第 7 名和一个第 8 名。这不仅是历史性的突破，而且是巨人的步伐……。它的价值不亚于洛杉矶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如果没有宏观思考就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宏观的结论。

独到的见解

善于把握全局的“毕大爷”的作品，由于高瞻远瞩，冷静客

观，观前断后，往往能幸或不幸地言中。

如寄对他有如下评价：“毕熙东写足球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见地，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居上角度审视这项人类为之疯狂的运动。他从未沉迷于足球运动本身而使文章受到情绪上的左右。这就保证了他文章的冷静和至关重要的宏观。”

1993年的伊尔比德之战，中国队胜了约旦队，人们普遍认为下一仗对也门队能轻易获胜，因为也门队实力稍逊于约旦队。毕熙东却没有这么看，他在《别认死理儿》中提醒人们：“……现在中国队的后场配置明显不合理，谁都看着乱，而且的确隐伏着危机。那就决不能因胜利而忽视自己的不足；更不能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否则，真到了把中国队领上黑路的时候就晚了”。论无虚发，中国队终以0比1负于也门队，于是有人骂毕熙东“乌鸦嘴”，但在心里还真服了“毕大爷”一把。

毕熙东写足球是如此，写其他项目也是如此。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前，他在一篇文章中对篮球作了分析，认为女篮可能夺取银牌，男篮则只能力争倒数第二。事实证明，这个预测十分准确。

1988年奥运会中他写的《大泽腾蛟》断言：“中国龙终于在沧海横流之中显出了英雄本色，开始了在世界泳坛上与列强逐鹿争雄的新纪元。”待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五朵金花”，开出四金五银，他4年前的预见得到了证实。

预见较准的奥秘何在呢？

毕熙东认为，主要是要深入了解体育项目，“要吃进去，用全部心力去吃”。记者全身心投入其中加以研究，熟悉了各方面的情况，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就可以发一家之言了。

因此，他说：“体育记者必须是个有心人，要注意资料的积累。因为我们即使热爱体育，参加锻炼，有某项特长，但因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体育的熟悉和认识显然要靠大量的经验，用别人的实践经验来充实自己，而且从爱体育、会玩球到懂体育、会看球，再到看出门道、写出有价值的见解，是完全不同

的三个阶段。……大凡优秀的体育记者都有自己的一本帐。”

在电视已日益普及的时代，一家之言、独到见解对一个文字记者是不可缺的。记者只有不人云亦云，敢于发表个人的见解，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毕熙东之所以被人称为“毕大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敢于独树一帜。

犀利的笔触

但是，阐发一家之言，特别是要直言不讳地说东道西，总会招来些非议，惹上些麻烦。所以，已有一把年纪的“老毕”还有个特定的称谓——“小毕”，“是谓其锋芒毕露，言必其所思，文必其所悟，绝不为媚上而作无骨的文章，为取宠而写讨巧的文字”。

毕熙东与人聊天时往往谈笑风生，对各种事情都要说上两句。他写文章也是如此，无论是体育运动本身的，还是体育道德风尚方面的，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众身上反映出的问题，只要有意义，他都要以尖锐、泼辣、明快、犀利的笔触予以褒贬，而且常常锋芒毕露，很少韬光隐晦，这是“熙东评论”的一大特色。

1988年奥运会开赛伊始，中国队除许艳梅外，其他人全部折帆断桨，前景一片暗淡了许多。此时毕熙东发表了这样的议论：“俗话说：学然后知不足。第一天的比赛失利，使他们在集世界精英的大赛场上，开始认识到中国体育的地位，也开始降低了某些一厢情愿的热度，冷静地面向世界，也冷静地面向自己。”

他的《羌笛何须怨杨柳——奥运漫评之二》也是如此。何灼强表现失常，有人埋怨记者话多，毕熙东拍案而起：“‘5.19’足球输了赖记者话多，这次失败了也赖记者话多，您说当记者的够多冤？其实记者冤点没什么，可这种为自己找台阶儿的心态实际上也是讳疾忌医的表现，以为这样便可掩饰自己的不足，自欺欺人，那你就永远别想进步。”

直抒胸臆，“小毕”是在说心里话，同时也说了读者想说而

无处说的话，这是“熙东评论”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譬如在1993年观看亚洲6强决战后，他写的《遥岑远目 把吴钩看了》就特别指出“政治因素的干扰”——“在许多本该精彩的场次中，被人为的痕迹严重地干扰，让观众感到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为了能让日本举办2002年世界杯，为了不让美国因伊拉克队的出线而尴尬，就得想方设法让亚洲六强决战变得尴尬起来。想想真是没劲透了。”这无疑也正是读者的心里话。

毕熙东的评论作品的笔墨中常带着“刺儿头”。像汉城奥运会上的漫评之四《应该怎样输？》，其笔锋直指女排的弱点——“其一，中国女排是带着‘五连冠’来到汉城的”；“其二，队伍严重老化，特别是主力阵容力不从心”；“其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队伍不团结”。而且剖析其深层原因——“就是捧得太高。作为任何一支运动队，目标都是拿冠军，拿了冠军也还是一支运动队，只不过进步比别人快了点儿，汗比别人多流了点儿。当然，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人民理应表彰。但作为运动队本身来说，不能失去本质的身份。那种立标杆、树红旗的做法，使‘三连冠’之后，荣誉、实惠一下全压在女排姑娘身上。”

这种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虽然辛辣但言之成理。

批评不是目的，冷静客观的背后是火热的拳拳爱国心。毕熙东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忧患意识，是对祖国命运的焦灼，对民族前途的忧思。他批评的最多的是足球项目，也正是足球评论更深刻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

对于中国足球队，毕熙东的文章中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但目的还在于希望他们把球踢好。就拿北京亚运会期间发表的《我想中国足球还得踢下去》来说吧。一看题目，就令人无可奈何地叹气。但他在文中说，“中国足球队被挤出了四强，那该怎么办呢？一起骂娘，又有什么用呢？”“……中国足球不属于哪一个人，但它却是大家的一份家业。谁为这份家业付出艰辛，谁就应当受到理解和尊重。从年维泗到苏永舜，从曾雪麟到高丰文，付出了几代人的艰辛，有时仍逃不脱失败的命运。这说

明中国足球的起点本来就很低，尽管有方法和认识上的失误，但却决不能因此否定那成吨的汗水、火热的情怀和永不投降的决心。……”字字血泪，慷慨悲凉，却发人深省，催人奋发。特别是着眼点在“我以为，中国足球还是得踢下去”，虽有些无奈，但不是悲哀。

毕熙东不仅对中国足球队说三道四，就是对足协的工作也坦率发表意见，表现出了一个优秀记者所应具备的责任心。

特别是在1993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结束后，“小毕”连发4篇评论；《一件好事》、《两个指标》、《三个要害》、《四个关系》，对会议内容予以评说。

“一件好事”是指中国足协工作的重心向孩子们倾斜，并有专款支持此项工作。毕熙东说：“一要抓紧，二要努力公关”，“望各方努力，把这件好事尽快办好。”

会议制订出规划——“男足力争进入世界杯前16名、奥运会前8名；女足进入世界前3名”，毕熙东评论中毫不讳言地指出，即便用了“力争”，这目标还是太高了。不过，他并未停留在批评上，而是提出建议，“抓住中坚反复锤炼”。

毕熙东认为：“体制、机制、赛制三方面是足球改革的要害”，提出了足协与体委脱钩的建议，并建议把市场机制引入足球运动，把西方的赛制拿来使用。他在《四个关系》中说“足协与体委的关系、足协与俱乐部的关系、俱乐部内部各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俱乐部与后备力量培养单位的关系等。这四个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他在文中指明了问题的实质，并大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思路，要层层解决好关系，协调组织，促进中国足球的进步。

作为一名体育记者，有这份爱国心和责任感，是难能可贵的，不然就不可能发一家之言，不可能直抒己见，也谈不出多少真知灼见，更不会成为受读者欢迎的记者。